

袁田 津门续书魂

■ 记者 田莹

袁田心里最惦记的,就是即将在天津挂牌的“袁阔成艺术研究院”。“成立这个研究院,不仅是为了传承父亲的遗志,更是想给评书艺术找个扎根儿的地方。”她快人快语,笑声爽朗,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她父亲袁阔成的影子。那些关于父亲的艺术坚守与生活趣事,也随着她的讲述,缓缓铺陈开来。

台上说古今
台下立规矩



袁田

“我父亲14岁登台,17岁‘挑帘红’。据说从那时起,观众就已经抢着听他说书了。”在袁田的记忆里,父亲的艺术人生是从北京月坛一家茶馆开始的。她上小学时曾偷偷跑去瞧过:茶馆窗户外挂着绸缎窗帘,盖碗茶飘香,百余个座位排得满满当当。最奇的是,茶馆外宽阔的窗台上也挤满了端着茶碗听书的人。“茶馆不收门票,只收茶钱。买了茶,才能听书,都算‘书座儿’。室内很快坐满,来晚的观众趴在窗口外面看表演,为了不被老板撵走,就自觉地买茶喝。”袁阔成是那家茶馆的台柱子,醒木一拍,满堂的茶水热气都会跟着一顿。

1956年秋天,营口红星茶社的杨掌柜到北京寻找说书先生,转了几家茶社,锁定袁阔成。“听我母亲讲,那位杨掌柜天天去茶馆听我父亲说书,连着听了一个月,张罗着要请吃饭。我父亲几次推脱不开,一问才知,他想请我父亲去东北。”袁田说。

袁阔成原本没有去东北的想法,但被杨老板感动,松口答应。海报贴在营口红星茶社门前,“袁阔成”三个字引来人们的好奇。头天晚上,上座率并不高,茶社的板凳只坐满了三分之一。袁阔成不慌不忙拍响醒木,说了一段《十二金钱镖》。书中人物鲜活,故事抓人,最后的扣子也留得十分精巧。他在营口一炮打响,稳稳地立住了脚。后来营口市曲艺团成立,袁阔成加入并担任团长,举家北迁。冰天雪地的关外,成了他艺术的第二故乡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袁阔成表演的短篇评书《肖飞买药》红遍全国。袁田记得有一年冬天,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,穿着薄薄的小棉袄找到团里,想跟袁老师学说这段话。袁阔成见她冻得脸色青紫,对袁田说:“你拿钱带她去百货公司,买件厚棉大衣。”

女孩在袁家住下,几周后学会

了《肖飞买药》。临走时,袁阔成给她拿了路费。“后来,这个女孩在哈尔滨当了讲解员。”袁田回忆说,“过去曲艺行当收徒弟讲究摆知,但我父亲没有这些讲究。他的口盟弟子遍天下,一些曲艺爱好者上门求教,他也不吝指点。”

袁阔成待人随和、热忱。街坊邻居自不必说,就连负责片区清扫的环卫工,他都熟络得像自家人。每当看到师傅们顶着烈日或寒风低头干活儿,他总会大声打招呼:“进屋歇会儿,喝口水再忙!”袁田记得上小学时,父亲骑自行车去学校接她,车后座永远坐着别人家的孩子,她自己则跟在后头一路小跑。

可对于教育自家孩子这件事,袁阔成却非常严苛。袁田小时候很淘气,有一回爬房顶踩坏了邻居家的瓦片,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没想到,邻居上门告状。袁阔成又是道歉又是赔偿损失,到晚上,让几个子女在墙根儿站成一排,揪出袁田这个“罪魁祸首”,狠狠训斥了一顿。

长大以后,袁田若是在艺术上敷衍,在生活中犯错,父亲依旧会让她靠墙站着反省。这站桩般的惩罚,成了她一辈子最难忘的记忆。但有一次,她不小心摔碎了父亲珍藏的青花瓷瓶,父亲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“下回注意”。“他最不能容忍品行上的错,撒谎、偷懒、敷衍了事,都万万不行;但对于无心之失,他却说,物件碎了能修补,人心伤了难复原。”袁田说,这就是父亲做事的标尺,从来不曾改变过。

以心血立书
以匠心传艺

提到袁阔成,绕不开他那部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365回《三国演义》。

评书行业里有“三碗酱”的说法,指的是《杨家将》《薛家将》《呼家

将》。它们都是英雄传奇结合民间传说,情节跌宕起伏,观众基础扎实,早年间是很多说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。可《三国演义》不同,这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才子书,包含海量史实典故以及原文,人物脉络纵横交错,对说书人极具挑战性。

为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,在录制前期,袁阔成带队踏上采风之旅。湖北赤壁古战场、四川诸葛亮点将台、河南官渡古战场、重庆白帝城……各处历史遗存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

录制过程困难重重,最关键的是,要对书稿进行反复推敲。比如“七擒孟获”这一段,原著描写得比较简略,要撑起时长,全靠细节增补。袁阔成到图书馆翻查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、兵器样式,逐字逐句打磨对话与场景,非要做到人物鲜活、情节勾人才肯罢休。

那年夏天,北京的天气热得像蒸笼。袁阔成怕热,却又要沉下心完善文稿。他琢磨出个法子,每天带着面包、汽水到家门口的地铁站里,找个角落,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“那时候录音用的是开盘式录音磁带,金贵得很,录时不能修改,念错一个地名,可能整段节目就白费劲了。”袁田回忆,父亲每次进录音棚前都要把脚背到滚瓜烂熟,语气的轻重、停顿的长短都要反复拿捏。

袁阔成常说:“说书人的肚子,得是个杂货铺子。”他看书向来很杂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常识无所不涉,这也是他能将各类故事讲得透彻的底气。对同样踏入评书行业的女儿,袁阔成立下严格的规矩:每年必须读五本书,其中有两本得是艰涩的理论著作,不仅要领悟,还得背诵关键章节。而这些要求女儿完成的作业,他自己都会提前掌握。

后来,袁田接到播讲故事《李大钊》的任务,但文稿干巴巴的,缺乏细节。她扎进档案馆查阅资料,到李大钊生活过的地方走访、考证,从历史

中挖掘鲜活的故事,凝练成饱满的人物。那段日子她瘦了十几公斤,作品虽只有三讲,却让她真切体会到何谓“立书”——走进故事,用血肉与心神把骨架填满,才能赢得听众的认同。

对于评书传承,袁阔成有自己的一套章法。他要求袁田在讲每一部长书前必须将原著“通读、细读、重点读”,连续三遍,还要做详尽的笔记,理顺人物关系与故事脉络,标注出每个人物的声口、步态、神情。他告诉女儿:“你心里得有个小舞台,谁在哪儿站着,谁跟谁说话,场景是明是暗,都得一清二楚,容不得半点含糊。”

袁阔成的艺术视野十分开阔。传统曲艺讲究一板一眼,严守门户与程式,可他偏要打破这个藩篱。他自幼练武,摔跤、枪术、刀术都拿得起来,步入老年后,他每天清晨仍到陶然亭公园练剑。他对袁田解释:“说书人的身段太重要了。你学武将长剑,自己没练过武,比划出来轻飘飘的,哪能显出人物的劲道与气魄?”他在四十多岁时说《杨子荣舌战小炉匠》,能一连串筋斗从台口翻到台中间,站稳时身如劲松、面不改色,引得台下观众齐声喝彩。也是从袁阔成开始,袁派评书大大增强了表演性,更讲究身段气韵,将这门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。

袁阔成的朋友圈涵盖戏曲、曲艺、书法等领域。他曾向京剧名家方荣翔、于魁智请教身段动作;向北京人艺的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讨教人物塑造方法。他与作曲家雷振邦是好友,两人通信探讨音乐休止符的妙用;还与歌唱家郭颂切磋丹田气息的运用。他把音乐的节奏感融进评书,在关键台词后特意留白,让故事的韵味愈发绵长。袁田说,以前她常与父亲一起去听交响乐,观演后,要向父亲交作业——说说自己的心得,想想如何把这些门道化到评书里。

生活中的袁阔成颇有情趣。他爱喝酒,与赵连甲、李金斗等好友常去小饭馆小酌,三两白酒下肚,谈艺论道不亦乐乎。他爱下棋,爱养猫、养花、养鱼,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练武术,可一旦沉浸到艺术创作里,这些爱好便会被他抛到脑后。

袁田回忆,袁阔成养过一缸热带鱼。那时候没有恒温水箱,换水时要调冷热水温。赶上他筹备讲非洲故事的评书《赤道战鼓》,白天黑夜都在琢磨情节。一天,袁田放学回家,刚迈进家门,就见父亲正端着一盆开水往鱼缸里倒,鱼已经翻着肚皮漂了起来。还有一次,他边浇花边琢磨书词,水漫阳台,渗到楼下,邻居找上门,他才发现水浇多了。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趣事与憾事,拼凑出一个更真实的袁阔成。

归来是传承
前路亦可期

“天津是我父亲的出生地,也是我的根。”提到回天津发展的原因,袁田的语气里满是深情。1929年,袁阔成出生在天津西站附近树德里大街一座平房小院。年轻时,他常在天津演出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,他连续五年受邀到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讲课,每次都是系统授课六个小时,再留两个小时给学生展示实践成果。后来,天津市曲艺团的专业演员都来旁听,大家都想多学些袁派评书的真东西。

父亲对天津的情结,在袁田心中也扎了根。小时候每逢暑假,她都来天津的姥姥家小住。红桥区纵横交错的胡同、南市街头飘香的小吃,还有天津观众对曲艺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懂行的喝彩,都一一写入了她的记忆。“天津是实打实的曲艺窝子,观众懂评书、爱评书,不用多铺垫,只要你说得地道,演得传神,大家就愿意听。”也正因为这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曲艺沃土吸引力,袁田最终选择回到天津,扛起传承袁派评书的大旗。

她在南市庆有西里社区创办了“庆有袁书场”,坚持常态化演出,至今已有两年多,吸引了不少老观众和新面孔。2025年,她将评书带进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等高校,本来还有些担心当下大学生对评书的兴趣不浓,没想到,近千个座位的礼堂首次座无虚席。学生们听得入神,散场后还会围着她探讨剧情与表演方法。“看到年轻人的好奇与认可,我就看到了评书传承的希望。”袁田欣慰地说,她已收了26名徒弟,计划再吸纳一批有志于评书传承的年轻人。

袁田心里有一长串计划:带着红色文化、津沽文化两大板块的特色课程走进中小学课堂,让孩子们感受评书的魅力;筹建袁阔成纪念馆,收藏展示评书手稿、演出道具;整理出版袁阔成未面世的评书脚本,让更多人了解袁派评书。

“我父亲一辈子都在琢磨怎么让评书变得更好,怎么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评书,我也想沿着他的路走下去,把这门艺术传下去。”袁田说,她最大的心愿是让年轻人知道,评书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,它既能讲述千年的历史,也能说尽当下的人间。她要在天津这片滋养了无数曲艺名家的沃土上,让袁派评书生根发芽,让这门古老的艺术枝繁叶茂、生生不息。

对话袁田
创作新评书
探索新模式

记者:您提到刚入行时,父亲不让您直接跟他学,非得让您出去拜师。现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,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?

袁田:这事儿啊,现在想想,心里早就没疙瘩了,反倒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。那时候我不懂事,觉得家里现成的老师不教,非让我绕远儿,心里委屈。后来自己带了徒弟,才咂摸出滋味儿,他是怕我圈在家里,只学一家的样儿,口气、路子都僵了出去拜师,眼界就打开了。我跟着李鹤谦先生学的不仅是活,还有别人家的门道、气象。自己闯一闯,碰碰壁,才知道江湖多大、说书的路子多宽。后来我父亲再点拨我,那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——他能给我“领”,我也能自己“走”了。这大概就是老辈人的智慧吧:真疼孩子,就得把他推出去见见风雨。我现在当教徒弟时也常想起这段往事。传承,不是照着一个模子去刻,而是要在心里先有自己的方圆,再回来接家里的规矩。

记者:您觉得当下要想发展评书艺术,会遇到怎样的挑战?您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创新尝试?

袁田:挑战有两个:一是观众断层;二是形式单一。了解评书的观众,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以上,他们有情怀,是听收音机长大的,可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没有精力坐下来听评书了;年轻的朋友对历史故事不熟悉,没耐心听长篇大论,觉得评书太古老,而且就是一个人、一张嘴,又不怎么搞笑,太冷清了。为解决这些问题,我们做了不少探索。比如,把长书拆短,录成十来分钟一段,发到网上,让大家等车、吃饭时听一小段。我们也创作了一批贴近当下生活的新作品,包括《南来北往》《盲途》等,拓宽题材。另外我们也在努力丰富表现形式,和天津京剧院合作,在舞台上,他们唱戏,我们说书,互相补充。我们还排演了“评书剧”,几个演员一起演,加上灯光、音乐,挺有戏。年轻人反响不错,没想到评书还能这么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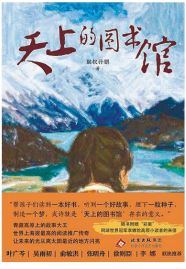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:对有志于从事评书艺术的年轻人,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?

袁田:首先,要耐得住寂寞。评书是慢功夫,没有十年八年的积累,成不了气候,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出名、挣钱。我父亲说过,一天不练自己知道,两天不练家里人知道,三天不练观众知道,必须每天坚持读书、练基本功,把知识面拓宽,才能做到“啥都知道”。其次,要爱学习、善借鉴。不能只盯着评书,要多了解其他艺术,看看别人是怎么表演、怎么吸引观众的。现在的年轻人能接触到更多的资源,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取长补短。第三,要守住初心,不要太功利。现在评书市场确实不景气,票价不高,演出机会不多,但不能因为挣钱少就放弃。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喜欢评书,是因为热爱,还是想通过它实现什么?如果是真心热爱,就会愿意为它付出,哪怕过程辛苦也值得。我相信,只要把功夫下到了,把书说好,总会得到观众的认可。传统艺术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。

(图片由袁田提供)

讲述

援藏干部在尼玛县创立公益项目“天上的图书馆” 当代马背上的图书馆员



《天上的图书馆》封面

口述 孙鹏 撰文 何玉新

6月19日,“阅读,生长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——《天上的图书馆》新书分享会”在北京举办。《天上的图书馆》作者孙鹏(笔名“猴叔孙鹏”)是一名援藏干部,他把援藏工作的宝贵经历写成四本书,已出版非虚构作品《云朵上的旷野》,长篇小说《羌塘没有树》《我的名字叫太阳》,《天上的图书馆》是他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作品。在分享会上,他道出了自己在乡村阅读、文化公益推广活动中的所思所感。

建起“天上的图书馆”
让西藏孩子爱上阅读

我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与著名作家徐则臣、石一枫同班。2022年7月,作为中海油的

援藏干部,我到那曲市尼玛县担任县委副书记。初到高原,眼中所见令我震撼:野牦牛在雪地中缓行,黑颈鹤在湖面上低飞,奔跑的藏羚羊比人还多……那是一种非常干净的状态。

我和这个地方有缘。我的高原反应很轻,同事们刚来时睡不着觉、头疼,而我几乎无感,只是不能跑步,走路路可能就会心率加快,记忆力也不像以前那么好,不过,钝感力变强了,能让我更好地静下心来思考、感受这样的生活。我会跟这片天地对话,晚上到灯光稍暗的地方看星星。高原抚慰着我的心灵,丰富着我的精神世界。所以,在这样一个高海拔、空气稀薄,会消耗我们身体的地方,我却感觉生命的能量得到了补充。我的能量一下子从60分变成了“满分爆表”,我觉得我来对了,这个地方真的需要我!

我是伴着阅读长大的。援藏前,我从事过童书翻译、儿童阅读推广,可能我是这届援藏干部里唯一从事过儿童阅读工作的人。所以,我最先想了解的就是当地孩子的学习环境,想知道他们在读什么书。

县里的初中生、小学生,再加上幼儿园的孩子们,总数为7000多人。他们可能是放羊娃、放牛娃,牧民家里没有电,更没有网络,通常不会有课

外书,阅读环境几近空白。但是,孩子们渴求知识,想通过学习打开更多认识世界的大门。当地师资紧张,多数教师来自内地,在缺氧、严寒中坚守。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:把这7000多个孩子变成7000多个小读者,让这里的学校飘满书香。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我和别人做什么不一样?如果在高原盖教学楼、盖宿舍的话,也很难,但谁都可以做。而在读书这方面,我能发挥更大的能力,我可以带领孩子们一起爱上阅读,帮助他们接触好书。这也许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美好的一件事,可能投入的资金、人力没有那么多,却能让孩子们受益终身。

基金会捐赠优质童书
满足当地孩子的渴望

2022年10月,我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,题为“谁来为高原上的孩子们建起一座‘天上的图书馆’”。第一个响应的是亲子阅读服务品牌“悠贝”的创始人林丹,她打电话告诉我:“我们可以想很多办法支持你,可以让很多机构、基金会加入这个项目,一起支持这件事。”

2023年,全国好几家基金会,包括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、中华少年儿

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等,都给我们“天上的图书馆”捐赠了优质童书。我们也通过对出版社、企业、爱心人士等,为尼玛县的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募集优质童书与绘本,搭建了爱心书屋与教室图书角。

当地的孩子们始终怀抱理想:有人想学医,有人爱画画,有人希望未来成为作家、科学家。有个孩子抱着一本书不肯放手,一口气读完,问老师:还有没有下一本?这让我意识到,他们对知识的渴望,比我们想象中的强烈得多。

一批又一批的作家、画家、阅读推广人、语文名师来到高原,也成为“当代马背上的图书馆员”。他们帮助孩子们阅读,破解阅读障碍与认知局限;帮助这里的老师们掌握教学方法,培养本地“点灯人”教师。他们给了我很大鼓舞,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杭州“六和公益”邀请刘敏、谢海燕两位老师远赴尼玛县,给孩子和老师播下阅读的种子。我认为刘敏老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——在海拔4860米的地方,她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绘本阅读课。这可能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绘本阅读课堂。

达瓦次仁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副校长。他用实际行动支持我们,给孩子们上藏文绘本课,用的是那本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。他现在还在做一件事:带着孩子们用藏文排演绘本剧《野兽国》。

西藏的孩子对色彩的敏感让人叹服,因为在那样一块地方,天的蓝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,湖水的澄澈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他们都有一双特别的眼睛,感受力是不一样的。这些孩子会特别认真地做一件看似很

小的事,他们画画没有功利心,只是单纯地想用色彩、形状等去表达内心,表达对美的向往。他们用大红的太阳、高耸的雪山、奔跑的羊群,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家乡与世界。在这个基础上,我策划了“100个故事——太阳之乡儿童画展”并进行全国巡展,带小画家们走出高原研学。



孙鹏

希望继任者继续做下去
图书馆的故事未完待续

“天上的图书馆”项目推进过程中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老师对我说:“孙鹏,你干这件事挺好的,你把过程记录下来,将来可以成为一本书。”所以,是韩老师最初帮我策划了这本书。我也想让更多人看到这里发生的故事,就把这些点点滴滴——包括我自己做的事,包括我遇到县里的老师、孩子们,包括来到高原的志愿者,把这些温暖的人、温暖的故事汇总起来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座小桥,是他们与我共同完成了“天上的图书馆”这个小小的奇迹,一起创作了《天上的图书馆》这本书。我特别感谢所有为这个项目添砖加瓦、呼吁过、捐赠过,到当地给孩子们上过课的朋友们。

藏北高原的尼玛县,是离太阳最近

的地方。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:“如果有天堂,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建在高原的图书馆,我们可以想象,它应该接近了天堂的模样。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,每一粒种子都值得等待,每一双翅膀都终将翱翔。

高原的孩子们敢于追求梦想,他们追求梦想的自信与韧劲都值得我们学习。从尼玛县阿索乡走出来的贡觉,如今依托中海油对口援藏政策到北京工作。他说,“天上的图书馆”项目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大改变,援藏干部的指导,像黑糖中点燃的蜡烛给了他方向。

一棵树的成长,是从播种到慢慢拔节生长,成为参天大树的过程;阅读也一样,从发蒙到开悟,是人生不断成长的过程。我们不但要让一本书长成一棵树,也要让更多的树长成一片森林。

我离开尼玛县之前,跟我的继任者说,希望我做的这些事,你们还感兴趣,还会继续做下去。我给他们介绍帮助过我的朋友们,但我也觉得,自己不是在给人家增加包袱,把自己喜欢的事强加给别人?是不是过于理想主义了?后来一想,可能是我心里不舍得吧。也许将来有一天,这些孩子可能会从读者变成作者,可能在他们当中会出现扎西达娃那样优秀的作家。

我也还在做着与藏北有关的事:完成了以尼玛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我的名字叫太阳》;走进各地的图书馆、学校,给小读者们讲藏北高原的故事;把《云朵上的旷野》《羌塘没有树》两本书的版权捐了出来,用于包括尼玛县在内的偏远地区的小学阅读公益项目。

其实,在当下中国,缺乏优质图书的中小学、幼儿园还有很多;还没有爱上阅读的孩子也很多。正如我在《天上的图书馆》结语中所写:“图书馆的故事,未完,待续……”